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编 1991.1.

中国
比较
文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5

BES 129

IC-55
:12

中國比較文學

1991.1.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B 805048

《中国比较文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季羨林 贾植芳
副主编 廖鸿钧 谢天振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景尧 乐黛云 季羨林 陈思和
陈秋峰 贾植芳 倪蕊琴 曹顺庆
谢天振 廖鸿钧

《中国比较文学》编辑委员会顾问

259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佐良 **方 重** 叶水夫 朱维之 杨宪益
杨 绛 李赋宁 林秀清 周珏良 施蛰存
赵瑞蕻 唐 弢 夏钦翰 黄 源 彭定安
谢挺飞

英语翻译 支顺福

封面设计 唐云辉

扉页题字 伍鑫甫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大连西路550号 上海外国语学院

邮政编码: 200083

电话号码: 5425300×50

中国比较文学

1991年第1期

(总第12期)

专 论

- 1 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贾植芳
- 21 论欧洲中心主义(续)……………**杨周翰**

中日文学比较

- 47 日本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孟庆枢
- 67 象征主义文学批评的东方尺度……………程 麻
- 79 “人民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评论……………王晓平
- 99 川端康成在中国
——《雪国》评价仁智之间……………李 芒
- 110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与谷崎润一郎的《细雪》……………文洁若
- 121 太宰治与中国文学
——关于《清贫谭》和《竹青》…………… [日] 松村定孝 著
慕芙蓉 译
- 133 用作引喻的典故…………… [日] 中西进 著
王晓平 译
- 138 禅与汉诗俳句……………林 林
- 146 芭蕉的俳句与杜甫的诗歌……………李 芒

- 155 从日中比较诗学看俳句诗体……[日] 松浦友久 著
袁之 译
- 166 汉语和日语里的字序颠倒现象……[日] 竹中宪一 著
方双建 译

日本作家与中国

- 179 论鹿地亘在中国抗战时期的创作……吕元明
- 193 芥川龙之介与中国……[日] 竹中宪一 著
劳模 译
- 200 永井禾原、永井荷风父子俩的上海之旅
[日] 入谷仙介 著
许朋远 译
- 216 日本现代诗人与中国大陆……[日] 芦田孝昭

史料钩沉

- 227 竹添井井《左氏会笺》中的剽窃……[日] 冈村繁 著
陆晓光 译
- 236 平安朝诗人与渤海使……[日] 金原理 著
柯森耀 译

资料与动态

- 245 周作人与谷崎润一郎……文洁若
- 248 ICLA 第13届年会即将在东京召开……茉荷
- 251 中国比较文学界元老之一方重教授逝世……徐国华
- 252 英文目录
- 254 编后



专 论

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

贾植芳

THE RETURNED STUDENTS FROM JAPAN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Jia Zhifang

This was originally a speech during the author's visit to Japan. In the large amount of historical facts collected here, certain major events occurring in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are recorded, and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of a number of writers who had studied in Japan are recounted. These were the leading figur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uch as Lu Xun, Guo Moruo and Yu Dafu.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analyses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y were in and the social planes of their activities. The author has not only specified the role they play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their basic feature and its causes. Compared with those returned from the West, students returned from Japan were more radical in their political attitude, and manifested a stronger modern spirit of the 20th century in literature. Taking Japan as a window of cultural import, they

made explorations with regard to Chinese culture, and consequently occupy a very significant place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China.

前记：今年十月间，我应母校——东京日本大学文理学部邀请，携老妻任敏回母校访问和讲学，前后为时三周。这篇讲稿，曾先后在日本大学、东京都立大学、东京大学、横滨大学、神户大学等处讲过，每次讲演后，都有座谈会与该地区的有关老、中、青三代学者和博士生、修士生、大学生漫谈。由于每次讲演的时限不一（或一小时，或三小时），所以内容繁简不一，多有变动，本文是我回国后加以整理而成。

在本讲稿成文过程中，曾得到陈思和同志的协助，在此顺致谢意。

诸位朋友，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个题目引起我的许多感触。在五十五年前，我大约也跟诸位在座的日本同学年龄差不多的时候，也加入了这个中国从晚清以来浩浩荡荡的留日行列，成了一名留日学生。当时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很多，经济来源也是各种各样的，主要的有两类，一类是拿了官费公派来的，他们当中除了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派来的以外，还有各省政权派来的；一类是自己家里出钱自费来的。我是属于第二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自费留学生。在来日本之前，我在北京一家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1935年底，北京发生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我也参加进去了，被当时的警察机关逮捕，关了近三个月，才由家里花钱托人把我保释出来，但警察局还给我留了一条“随传随到”的尾巴，于是，我只好由家里出钱逃到日本来了。查考起来，中国从清末1898年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革命派人士东渡日本避祸以来，日本因和中国是一衣带水之隔，一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逋逃藪，正象俄国历代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以西欧为逋逃藪一样。我当时十九岁，就成了政治流亡分子，半是逃亡，半是留学，子

然一身地到了日本。先进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继续读日文，旋即考进了日本大学社会科，师事园谷弘教授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开始了留学生的生涯。我在日本的时间不长，大约一年半还不到，因为中日战争爆发而回国。但这一年多一些的留学生活，给我以后的生活道路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虽然我在出国前就早已学习创作文学作品，并向报上投稿，但我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与国内的新文学运动直接发生关系，开始向继承了鲁迅战斗传统的新文学刊物《工作与学习丛刊》投稿。这个刊物的主编是鲁迅的学生，著名的左翼文艺评论家胡风先生。从那时候起，我与胡风先生有了通信联系，成了朋友，并在他的鼓励下，一步一步地，正式地投入了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因此可以说，我的人生道路发生转折，就是从留学日本开始的。就是胡风先生本人，也是留日学生，他来日本留学的时间比我早，走的也早，他是因为参加了1925年的中国大革命运动，后来在蒋介石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于1929流亡到日本留学，并在庆应大学英文科学习，我们虽然是不同时代的留日学生，但都算是亡命兼留学，在这一点上则是相似的，而这一点又正是我们后来成了朋友的根本原因。又因为他留学时期参加了当时的日本左翼文艺运动和日本共产党，被日本警察逮捕关押后，于1933年被驱逐回国，在上海正式投入了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成为职业作家。因此也可以说，留学日本是他生命史上的一大转折点，因为以此为契机，他和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才正式发生联系，而这一点，又是我们之间的另一个相似之处。

其实，从本世纪初算起，到日本后才开始搞文学运动的人并不是少数。中国新文学运动即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从1917年开始的，当时主要的作家、诗人和评论家大都是留学生。一类是从欧美回来的留学生，象胡适，人数比较少；另一类就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那是一大帮人，象《新青年》的主要作家中，陈独秀是东京高等师范的学生，李大钊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鲁迅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后

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周作人是立教大学学生，沈尹默和钱玄同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学生，陈望道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文学与社会科学，高一涵是明治大学的学生等，除胡适，刘半农等几人外，几乎都是留日学生。而且他们中有许多人原先去日本留学时，不是搞文艺的，都是在日本改变了生活道路，转向新文艺运动了。鲁迅就是其中很著名的例子^①。

在1928年，新文学著名的诗人郭沫若开始转向“革命文学”，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桌子的跳舞》，在文章中他很自负地宣称：“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慧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没有前两派的势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两派的影响。”^②郭沫若的这个说法，未免有些以偏概全，因为他所指的“中国文坛大半”，其实是指由他和郁达夫、成仿吾等留日学生组成的创造社。创造社除留欧学生王独清外，当然以留日学生为主，郭沫若自己是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出身，郁达夫是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科出身，成仿吾是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出身，张资平是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科出身，田汉是东京高等师范英文科出身，陶晶孙是郭沫若福冈九州大学医科的同学，郑伯奇是京都帝国大学心理学科出身，等等。但二十年代成立比创造社还早的另一个重要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则不然。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成员是一些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叶圣陶、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王鲁彦、朱自清等人当时都没有出国留过学。把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个发起人算上，那也只是周作人、朱希祖和蒋百里三人是留日学生。除周作人外，其他二人都

① 参见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 见《郭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P.333，1954。

与文学没什么关系。朱希祖是早稻田大学出身，是个历史学家；蒋百里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虽然早期用蒋方震本名写过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但他主要从事军事学方面的著作，他本人是著名的军事学家。文学研究会只有少数作家是留日学生，如著名的日本文学翻译家和散文家夏丏尊与谢六逸。夏丏尊是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出身，谢六逸则是早稻田大学出身。另外语丝社也并不都是留日学生组成，除了《新青年》社的一帮老人马以外，废名、林语堂、川岛、章衣萍、孙伏园等年轻一辈的作家都不是留日学生。二十年代另外一些重要的文学团体，除太阳社以外〔太阳社的主要成员林伯修（即杜国庠）、楼建南（适夷）、冯宪章、森堡（任钧）等则是留日学生。1929年，他们还同旅居日本的蒋光慈一起成立了太阳社东京支部，吸收留学生伍劲锋、左公亮、胡晓春等人参加〕如新月社、现代评论社、浅草社、莽原社、末名社、狂飙社等等，也都不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所以郭沫若的话是值得商榷的。除了有自我吹嘘、暗示创造社为中国新文坛正宗的用意外，还包括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当时创造社正吸收了一批新的成员，如李一氓、冯乃超、李初黎、彭康、王学文、朱镜我等，这些人大都是东京或京都帝国大学出身，都是青一色的留日学生。他们带来了“革命文学”的理论武器，正要野心勃勃地在文坛上开展一个“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向不甘心落后于新形势的郭沫若以老留日学生的身份说这段话，正是暗示了这两代人之间的认同。

不过郭氏的话中仍然包含了一个明显的事实：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确实有密切的关系，至少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是这样的。美国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有一段话倒说出了几分道理，他说：“当时较具有吸引力的作家，几乎清一色的是留学生。他们的文章和见解，难免受到留学所在地时髦的思想或偏见所感染。说真的，我们即使把自由派与激进派的纷争看做留

美、留英学生与留日学生的纷争也不为过”。^①夏氏这段话除了“清一色”这个词用的太武断以外，大致观点是可取的。他把留美、留英与留日学生看作是新文学阵营中的两派，并把留英美学生说成是自由派，把留日学生说成是激进派，这大致也是对的，合乎历史实际的。因为前者的代表先有学衡派，后有新月派和现代评论派；后者的代表是《新青年》中的大部分成员以及创造社和左联，用“激进”来形容留日学生，大致不为过。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新文学初期有一大批作家是留日学生，他们以激进的姿态投入并推动了新文学运动。这里所说的“激进”，不是指新文学的形式探索，而是指政治态度。在五四初期，留日学生激进地主张批孔、批三纲五常，反对封建传统，向往朦胧的社会主义理想（包括无政府主义理想）；在二十年代以后，留日学生激进地提倡马克思主义，提倡“普罗文学”，反对国内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和白色恐怖，推动了左翼文学运动，这其中包括创造社的前后期主要人物，三十年代左联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主要领导干部周扬、夏衍、田汉、胡风等人。他们在文学创作上，敢于大胆地暴露个性的真实，敢于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批评现状无所顾忌——这些当然只是指大致的创作倾向而言，并不是每个留日学生出身的作家都是如此。象五四退潮以后的周作人以及写过《兰生弟的日记》，又译过岛崎藤村的《新生》，先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的徐祖正等一批京派教授作家，就都是自由派。

相反，留美学生似乎更注意新文学形式的探索。胡适提出“八不主义”，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国语的文学，强调废除古典文学的一切清规戒律。我们只须将胡适与周作人两人在五四初期的论文比较一下。胡适的《论短篇小说》、《谈新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52页。台湾传记文学社，1979。

诗》、《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等，几乎对小说、诗歌、戏剧、语体等各领域的形式改革都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周作人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论文，如《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等，几乎都是着眼于文学思想概念的改变，即使介绍日本文学也着眼于创作特点的介绍，对于日本借鉴西方文学的特点创造现代文学，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创造性的模仿”。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三十年代两个诗人——留日学生郭沫若与留美学生闻一多两人对新诗的贡献。郭沫若是逞才气，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大喊大叫，突破一切诗歌的规律，将古今中外的经验全都写到诗歌里去，首先是在诗的精神内容上，奠定了浪漫主义诗风。而闻一多的诗虽也是浪漫主义，但他更注重的是诗歌形式的探索，更讲究格律布局。所以他的诗的气魄要比郭沫若小得多，但诗风却要更高雅一些。另一个留学英美的诗人徐志摩，抒情诗写得比闻一多洒脱，但他的诗也相当注重形式的探索，与郭沫若诗的粗犷也不一样——这大概就是留学英美的学生与留日学生对新文学所贡献的不同侧重点，他们之间不同的文化性格与文学气质。

他们之间还有一个不同，留学英国的作家，基本上都崇尚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他们身处保守的英国文化环境中，对于新掘起的现代艺术几乎没有什么感受，徐志摩是唯一受过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影响的作家，但他的模仿仅限于不用标点符号。^①另一个让徐志摩钟情的是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Katherine Mansfield)的温情脉脉的小说，但对于更为敏感地表达着现代人感受的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却没有能充分地注意到。至于留美学生中，有一大批人都受到哈佛大学(Havard University)教授、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 Babbitt)的影响，他们崇尚古典主义，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以下就不屑

^① 参见徐志摩《康桥西野暮色》，收《徐志摩诗集》4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一顾,因此对五四时期流行的浪漫主义思想颇不以为然。这批人中有学衡派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稍后还有新月派的梁实秋。只有胡适例外,他倒是注意到美国新崛起的意象派诗歌(Imagist Poetry)他的“八不主义”与意象派诗人罗威尔女士(Amy Lowell)在《意象派宣言》中推出的六条标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是胡适善于吸收国外先锋艺术来推动国内文学改革的一个聪明例子。但有趣的是,尽管当时许多人都看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如朱自清、刘延陵、梁实秋、梅光迪都指出过这一点,可是胡适却始终不曾承认。他宁肯说他的文字改良主张是受但丁(Dante)乔叟(Chaucer)这些古典作家的语体革命的影响。正如有的研究者说,胡适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考虑到意象派诗歌在美国也是刚刚崛起的新思潮,还未得到美国正统文学界的认可,他不敢因此而失去国人对白话文运动的信任。他假托自己是受了但丁、乔叟这些古典艺术大师的影响,也正是想借助这些成功的例子来抬高自己^①。从这些例子来看,留英美的学生确实受到他们所在国的文化环境影响,在对外来文学的选择上,态度是保守的,或者是暧昧的。而留日学生正相反,也许日本当时正处于欧风美雨的侵袭下,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日本文坛上也演出了各种欧洲文艺思潮,从浪漫主义到自然主义,又流行着世纪末的各种现代思潮,诸如表现派、象征派、未来派等等。正如出身京都帝国大学,又是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之一的郑伯奇所指出的:“创造社的浪漫主义从开始就接触到世纪末的种种流派。”^②也就是说,留日学生所接受的浪漫主义思潮不是很纯粹的,它总是和各种现代思潮联系在一起,带上了现代思潮的烙印。这种状况并非创造社所独有。再

① 参见王润华《从新潮的内涵看中国新诗革命的起源》,见《中西文学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8。

② 参见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13页,良友图书公司,1935。

推前一点,鲁迅写《摩罗诗力说》的时候,也毫不例外地将介绍拜伦(Byron)、雪莱(Shelley)、普希金(Pushkin)和介绍尼采(Niezsche)叔本华(Schopen-hauer)夹杂在一起。周作人在1921年写的《三个文学家的纪念》中,把福楼拜(Flaubert)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和波德莱尔(Baudelaire)放在一起加以论述,视为一体。——大致说来,留日学生在吸收外来影响方面是相当庞杂的、混乱的,也可以说是多元化的;但比起留学英美的学生来看,他们比较不保守,多吸取了与二十世纪精神相通的现代哲学和文学思潮,光凭这一点来说,他们有了这份精神,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皈依马克思主义并走向革命,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们在文学上的生命力,确实比留学英美的作家更强有力一些。

有了上述这一大致的印象以后,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来探讨,为什么留日学生在中国现代文学上能够形成上述两个特征?为什么他们在政治态度上比较激进,在文学上更加具有强烈的二十世纪现代精神?这似乎要从留日学生的处境与环境说起。

在当时有一本写留日学生的通俗小说,叫《留东外史》,作者向恺然,是在二十年代曾经以平江不肖生的笔名写过一些很出色的武侠小说作家。他在这本小说中,从一个侧面讽刺了民国初年留学界的腐败情况,他说:“原来我国的人现在在日本的虽有一万多,然除了公使馆各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大约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第三种是使着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①

这话虽出于小说家言,而且语多讥讽,不足为信,不过他对这四种人的概括,倒是十分有趣的。如果我们把它改造一下,不妨改成以下四种:

^① 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留东外史》1页,岳麓书社,1937。

一、是正经求学，学习各类政治军情工商科学，以求毕业后谋个正经职业。

二、投着资本、或者没有资本，只是在日本经商赚钱的，如同现在许多来日本留学的人，名曰“留学”，实为“扒分”（打工）者。

三、无心学习专业，借留学为名追求个人的欲望——说好的，是个性的追求；说坏的，专讲嫖经食谱。

四、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志士，有爱国的，也有颓废的，（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的遗老也亡命过日本，如王国维）。

如果不带贬意地看这四种赴日人士，大概与文学有关的只能是后两种人。因为前两种人中，正经读书的多半不忙文学，说好听些，于救国有直接关系，说难听些，可以谋个好饭碗，学政治的可以当政客，学军事的可以当个军阀，学工商经济的可以办实业，学科学的至少能找个薪水很高的技术工作。至于学文学的人，在当时恐怕不会象现在这样受人尊敬吧！所以我曾大约统计了一下，新文学初期至二十年代的留日作家中，几乎都是半路出家搞文艺的；真正科班学文学出身的，先前只有钱玄同，他是早稻田大学文学系的学生，但那时候的文学大约与新文学创作也非一回事，钱玄同也从没搞过创作，他是个著名的语言学家；再后一些学文学的是创造社的冯乃超和穆木天，一个在东京帝国大学学过美学和美术史，一个在京都帝国大学学过法国文学，俩人都创作过象征诗歌。但似乎后劲也不足，很快就改行去搞政治或者搞翻译了。所以正经求学而想当作家的，实在没有什么人。第二种人是为了“扒分”才去日本经商的，与文学更无缘份。所以，剩下的只能是第三种和第四种了。

我指的第三种人，绝不是向恺然在《留东外史》里写的那些只会嫖女人的不学无术之徒，也不是鲁迅笔下的那些把辫子盘在头顶上，跳舞跳得咚咚响的“清国留学生”。我想说的这种留学生，在国内时多半出身旧式家庭，精神受着传统礼教的压抑，个性处

于萎顿状态；他们一到了日本，除了每月的开销多少要家里补贴一些外，其他方面都摆脱了日常的束缚，不再需要低眉顺眼，装出一副老实样子去讨长辈的喜欢，也不需要整天跟自己并不相爱的旧式妻子厮守在一起，甚至也没有中国社会环境对年轻人的种种有形无形的压迫。他们新的生活环境里自由地接受着来自全世界的各种新思想，慢慢地个性从沉睡中醒来，有了追求自身幸福的欲望。对年轻人来说，最现实的幸福莫过于恋爱自由，这在国内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直到1922年，湖畔诗人汪静之在一首诗中说，他要“冒犯了人们的指责”，才能够“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①。而留学生在国外，这个禁忌打破了；那时离婚法还没有，但不管家里有没有妻子，他们都可以自由放任地去寻找意中人。这一点，我们从一些留学生后来的自白中都不难找出例证。周作人就这样说，他到东京后：“在伏见馆（周的住宿处）第一个遇见的人，是馆主人的妹子兼做下女工作的乾荣子，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来给客人搬运皮包，和拿茶水来的。最是特别的是赤着脚，在房里走来走去。”于是惹得这位莘莘学子赞美了一番女子的“天足”，并得出结论是日本人“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俭朴”，^②这个结论可以说是支配了周作人的一生，他不久就娶了日本女子羽太信子做妻子，这位日本女子也支配了周作人的一生。周作人对日本很有好感，直到晚年，他还重申自己在东京的这几年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也没有受过大的国际事件的刺激”。^③这种对日本的良好感觉，应该与他在那儿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个人幸福有关，以至后来影响了他的政治命运。再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是郁达夫。郁达夫也是一到日本就关心日本的女人的，他在回忆录里这样说：

① 汪静之：《过伊家门口》收入《蕙的风》，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

② 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176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

③ 同上，188页。

“独自一个在东京住定以后，于旅舍寒灯的底下，我街头漫步的时候，最恼乱我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①郁达夫在这里所说的“国际地位”问题，无疑是指他由于是中国人而受到日本少女的轻侮。他们叫他：“支那人”，那种轻蔑的语气，使神经敏感的郁达夫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出于一种报复，也是出于一种自卑，他终于去了一次日本的妓院，出卖了自己的童贞^②。关于这一些，郁达夫后来都变态地把它写进他的代表作《沉沦》里面。郁达夫没有周作人那么幸运，他始终对日本民族歧视抱着憎恨的态度。他终于在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的武吉丁宜附近。他是1938年底在抗战中到南洋从事抗日爱国文化活动的（铃木正夫教授为此作过切实的考证，对郁的研究很有贡献）。

这两个一正一反的例子似乎也不能够概括这一类的留日学生，各人的情况总是多种多样的，但这里似乎说明了一个倾向，即后来投入新文艺运动的那些留学生，几乎都不安心于他们从事学习的专业，他们在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里寻找着远比求专业更为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个性的自由发展，个人欲望的获得满足。为了追求这一点，他们宁可放弃专业学习，放弃有保障的社会地位，而从事那充满着骚动与宣泄的文学事业。或者说，从事新文艺正是他们追求个性的一个必然结果。他们的恋爱、浪漫、创造，用弗洛伊德(S. Freud)的观点来看，多少有点关系；这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可看出。这些留日学生几乎无一例外地喜欢在创作中袒露自己内心的隐秘，把宣泄个人隐私视作一种艺术要求。所不同的只不过是有些人直率一些（如郁达夫小说，郭沫若的

① 见郁达夫《雪夜》，收入《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1982。引文见94页。

② 同上。